

論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

孟憲實

提要：唐高宗時期，武則天已經與唐高宗並稱“二聖”，傳世權威史書無不言之鑿鑿。然而遍查文獻，使用“二聖”一詞的報告，只有屬於宮中範圍的兩例。既不見“羣臣朝、四方奏章”的使用，更沒有民間的應用。尤其在當時衆多的龍門石窟題記中，更是一例未見。所謂“二聖”並稱之說，雖然有所淵源，但都屬於遠離真相的擴大化之辭。

關鍵詞：二聖 武則天 唐高宗 龍門石刻

武則天篡唐，是唐朝三百年歷史上的大事。女人稱帝，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之大事。影響巨大的唐代歷史著作，無法回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這些著作，多把武則天的野心逐漸膨脹、奪權逐步升級看作是事件發生發展的基本線索。高宗時期，作為皇后的武則天與唐高宗並稱“二聖”，就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情，被看作武則天通向權力頂峯的一個重要臺階。古史如此記載，今人

也有研究,基本的狀態是大家深信不疑。^①但是,二聖稱謂的事實究竟怎樣,本文希望有所探討,以就教方家。

一 傳世史籍的相關記載

“二聖”之稱,並非始於武則天、唐高宗。對此問題的考察可以了解,這種稱謂此前就存在,說明“二聖”稱謂的歷史淵源。同時,進行歷史上同一稱謂的縱向比較,也可以清楚雖然同稱“二聖”,但很多具體情況並不相同,這對於理解武則天與高宗並稱“二聖”問題,不無幫助。

北魏時期時有女主臨朝。文明太后馮氏,在孝文帝時期臨朝聽政,《魏書》的記載是“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②而《北史·李彪傳》記錄其上書有言曰“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③當時上書稱“二聖”,十分正常。

北魏肅宗在位時,胡太后被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④胡太后與肅宗,被正式稱為“二聖”,見諸史書甚多,比如高謙之上書就稱“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⑤此

① 在眾多的武則天研究文獻中,絕大多數對此不作質疑,也有學者認真研究此事,如王炎平先生《論“二聖”格局》一文,就是在承認“二聖”並稱的前提下進行正面論證的。見《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頁196—204。

② 《魏書》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29。

③ 《北史》卷四〇《李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453。

④ 《魏書》卷一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337—338。

⑤ 《北史》卷五〇《高謙之傳》,頁1830。

類證據甚多，不再詳列。

太后臨朝，皇帝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之間存在晚輩皇帝與長輩女性的一層血緣關係，雖然不盡正常，因為適合孝道的解釋，畢竟有可理解之處。但是皇帝皇后夫妻之間與這種情況不同，尤其是在皇帝制度之下，任何人與皇帝並列都有違皇帝制度的根本宗旨。皇帝制度的許多特殊規定，無不是為了突出皇帝獨一無二的地位，這是為了保證政治秩序的穩固。所以，皇后與皇帝並稱之事，常常引起嚴重關注。

在武則天之前，最著名的例證是隋文帝時期的獨孤皇后的稱號。《隋書》記載獨孤氏在隋文帝時，“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①《北史》也有類似記載“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②到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述中，文字多與前合，但是也不盡相同“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③

史書尚有唐高宗把唐高祖、唐太宗同稱為“二聖”之例，^④這種“二聖”說是一種追述祖宗的恭敬之辭，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碑文作者是齊士員，官右監門中郎將、右勳衛郎將、檢校左右領府郎將、長樂宮大監、定州刺史、上柱國延陵縣開國子。碑是一佛二菩薩玉雕，而碑文稱“太武

① 《隋書》卷三六《文獻獨孤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109。

② 《北史》卷一四《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傳》，頁533。

③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5446。

④ 乾封二年二月詳議明堂定，詔曰“朕以寡薄（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冊府元龜》卷五六四，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6772上。

皇帝穆皇后二聖供養”。^①齊士員參加過太原起兵,最後陪葬獻陵。他的供養石像,是給唐高祖及穆皇后製作的,聲稱是“二聖供養”。這裏的“二聖”,是指高祖與穆皇后。太武皇帝是唐高祖李淵的謚號,^②而穆皇后是竇皇后的謚號,係武德元年(618)六月二十二日追謚的結果。^③這種對於先帝、先后的二聖稱謂,也屬於尊稱表達,與在世時皇帝、皇后的並稱還是有所不同。

當然,史籍所載最多的還是唐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唐會要》記錄武則天,“顯慶五年(660)十月已後,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④《會要》此文,十分模糊,究竟是誰稱武則天與高宗為“二聖”並不明晰,只說“當時”有這樣的稱呼,這個稱呼的起始時間也不明確,究竟是從武則天參預朝政時開始呢還是後來纔有此稱謂,一概不清。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在上元二年(675)三月有如此記錄:

時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為“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⑤此處明確說明,高宗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始於上官儀被殺後。而上官儀被殺是麟德元年(664)十二月。那麼,所謂“二聖”之並稱,也是從麟德元年以後纔有的,時間很清楚。不過,《新唐書·則天

①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二,《全唐文》(11),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10498上一下。

② 《唐會要》卷一《帝號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

③ 同上書卷三《皇后》,頁25。

④ 同上書,頁26。

⑤ 《舊唐書》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00。

《皇后紀》的記載有所不同，其文如下：

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由是參豫國政。后既專寵與政，乃數上書言天下利害，務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陰欲廢之，而謀泄不果。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之“二聖”。^①

《新唐書》此處的記載，“二聖”之並稱不是麟德以後而是上元元年開始，當時高宗改稱天皇，則天皇后改稱天后，從此開始有“二聖”之稱。兩《唐書》對此事記錄的時間相差十年，至於範圍似乎是一致的，《舊書》為“內外”，《新書》為“天下之人”，都在說明這“二聖”之稱是範圍廣泛的。

不過，同是《新唐書》，在《后妃傳上·則天皇后》中又與《舊唐書·高宗紀下》的記錄相接近，在殺上官儀之後，用如此文字記錄道“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②這裏提供的信息是更具體的，因為“二聖”稱謂的使用場合非常明確是“羣臣朝、四方奏章”，即十分正式的使用方式。而時間則是誅上官儀之後，與《新唐書·則天皇后紀》的說法有異。

司馬光《資治通鑑》成書於《新唐書》之後，在“二聖”的記載上很明確定位於麟德元年十二月，在描述上官儀被殺之後，用這樣的文字記錄了此事“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③

① 《新唐書》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1—82。

② 同上書卷七六，頁3475—3476。

③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頁6343。

《通鑑》的說法,又有《通鑑考異》提供進一步的史料來源。《唐曆》有如下記載“羣臣朝謁,萬方表奏,皆呼爲二聖。帝坐於東間,后坐於西間。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對此,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寫道“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羣臣朝謁乎!恐不至此。今從《實錄》。”^①司馬光的《通鑑》在這段記載中尊重《實錄》而不信《唐曆》,但是重點不在是否稱“二聖”,在於武則天是否與高宗對坐接受朝謁。那麼,關於“二聖”的記載,《實錄》與《唐曆》是否一致並不清楚。

此外,關於武則天與唐高宗並稱“二聖”的記載,還有《太平御覽》的兩段文字,具體內容如下:

上元二年三月丁巳,天后親蠶於邙山之陽。時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②

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爲“二聖”。^③

兩段文字,也有上述一樣的問題,在突出武則天大權在握的同時,給出“二聖”之稱的時間依然參差。這些文字,可以看作與《新唐書》史源相同,所要表達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武則天與唐高宗並稱“二聖”,是武則天大權在握,甚至與唐高宗威勢無異的表現和證明。在諸書的描述中,“二聖”的格局是武則天權力增長的一個重要時期,正是因爲有此類基礎,纔有後來的順利稱帝。

① 《資治通鑑》卷二〇一,頁6343。

② 《太平御覽》卷一一〇“高宗天皇大帝”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529上。

③ 同上書卷一一〇“則天皇后”條,頁529下。

高宗之世，這些史書之外，到底還有沒有證明高宗、武后並稱“二聖”的證據呢？筆者搜索文獻，獲得兩條證據。其一，太子李賢對父母的稱謂。《全唐文》卷九九載有章懷太子李賢的《西明寺鐘銘》，記為麟德二年二月八日：“皇太子奉為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①麟德二年是公元665年，二月是上官儀被殺之後的三個月。

其二，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在給太子上啓諫的時候，提及皇帝、皇后稱為“二聖”。這篇啓文為《冊府元龜》卷七一四《宮臣部・規諷第三》全文所錄，並說時間是在“永隆中”。原文“倘馬逢佚馭，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當時的太子就是後來的中宗，薛元超的諫書是因為“時皇太子在京師，頗以畋獵為事”，文中還提到“天皇所賜誠書，殷勤切至”。^②顯然高宗當時在洛陽，對於太子在長安的行為是很關心的。必須注意的是，薛元超雖然是中書令，同時兼任的左庶子則是東宮官員，所以這篇啓文，開篇就是自稱“臣”云云，即是以東宮大臣的身份上啓的。

二 “二聖”之稱究竟屬於天下人還是屬於宮中？

現在所知，高宗在世之日，皇帝皇后並稱“二聖”的，惟有隋文帝與獨孤皇后一例。這與武則天與高宗並稱“二聖”最有可比性，所以不能不重點討論。二者都並稱“二聖”，從現在文獻資料看，二者最大的差異是使用這個稱謂的範圍不同，隋文帝與獨孤皇后，十分明確是“宮中稱為二聖”，上引《隋書》、《北史》、《通鑑》三處

① 《全唐文》，頁1019下。

② 《冊府元龜》卷七一四，頁8493下，8492下。

文獻,完全一致。而武則天與唐高宗的“二聖”之稱,範圍卻大得多。《唐會要》的說法模糊,是“當時”,而《舊唐書·高宗紀下》與《新唐書·則天皇后紀》記錄“稱為二聖”的範圍分別是“內外”和“天下之人”。同是《新唐書·后妃傳上·則天皇后》又把“天下之人”的說法具體化,叫作“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從《通鑑考異》的文字看,更早的《實錄》和《唐曆》也應如此記載。總之,比起隋文帝與獨孤皇后的二聖之稱來,武則天與唐高宗的二聖稱謂使用範圍擴大了,從“宮中”擴展到了外朝甚至“四方奏章”。如果說獨孤氏與隋文帝的“二聖”之稱,還可以具體理解為宮中的一種習慣尊稱的話,那麼真如《新唐書》所記,武則天與唐高宗的並稱二聖,則應該是公文書的正式規定了。

皇帝制度下,一切正式稱謂都有權威規定。《唐六典》卷四禮部郎中、員外郎條曰:

凡君臣上下皆有通稱。凡夷夏之通稱天子曰皇帝,臣下內外兼稱曰至尊,天子自稱曰朕,臣下敷奏於天子曰陛下。……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六宮已下,率土之內,婦人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稱妾,百官曰殿下,自稱曰臣。百官於皇太子亦曰殿下,自稱名,東宮官則稱臣。^①

稱謂問題,根據雙方的關係形成特定的系統,對於天下人而言,皇帝、皇后的稱謂是有不同的,這就是陛下、殿下之別,但是天下之人對於皇帝皇后都要自稱為臣。這其中的含義,一方面要區分皇帝與皇后,一方面要明確天下都是皇帝、皇后之臣。

在正式規定的稱謂中,因為人物與關係的不同,稱謂可以改變。比如,天下婦女對於皇后的稱謂是殿下,而自稱為妾。這與天下人稱皇帝為陛下,自稱為臣是對應的。皇后母儀天下,根據《白

① 《唐六典》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12。

虎通義》的解釋“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①很清楚，在傳統的觀念中，皇后是僅次於皇帝的人物，所以稱為“小君”，正是比照皇帝而言之。

皇后的地位僅次於皇帝，這也可以從稱謂中得到證實。皇太子是天下儲君，皇位的法定繼承人。百官對於皇后要稱殿下，此與皇帝的陛下之稱相別，而與皇太子的稱謂相同，但百官對於皇后要稱臣，而對太子自稱名即可，不必稱臣。與此相關，皇太子的東宮官，卻必須向太子自稱臣。於是，皇帝、皇后、皇太子的地位差別就表現出來，皇帝最尊，其次皇后，最後是太子。

稱皇帝、皇后為聖，真的是正式規定嗎？現在起碼看不到這類證據。大曆十四年（779）七月，當時吏部尚書顏真卿的報告說：“高祖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號，文字繁多。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盡有順聖之名……”^②如此說來，用“聖”字指稱皇帝，其實主要是一種尊號，並不是如“陛下”這樣由法令規定下來的稱謂。神龍政變以後，武則天又尊號“則天大聖皇帝”，逝世以後，謚號和尊號多有改動，最初謚號為“大聖則天皇后”，後來改為“天后”、“大聖天后”、“天后聖帝”、“聖后”、“則天后”等。天寶八載（749），追尊為“則天順聖皇后”。^③看來，確如顏真卿所言，聖字用於尊號、謚號，在唐朝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不可認為是法令規定。而武則天既然已經不是皇帝，但是她的子孫們還常常以聖字相稱，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順沿習慣的表達。

如果天下之人合稱皇帝、皇后為“二聖”，那就是混淆了皇帝

①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〇《嫁娶》，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89。

② 《唐會要》卷二，頁18—19。

③ 同上書，頁27。

與皇后的區別,是對皇帝至上觀念的挑戰。但是,如果僅僅是後宮把皇帝、皇后並稱為“二聖”,如隋文帝與獨孤氏那樣,這種稱謂是否有違君綱呢?這個具體情況必須給予認真對待。後宮女官衆多,但衆星捧月,皇后纔是後宮的最高首腦,而女官之職各有分工,都是圍繞皇后進行的。比如妃三人,正一品,根據《唐六典》的說法“夫人佐后,坐而論婦禮者也。”六儀六人,正二品,“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屬以贊導后之禮儀”。其他後宮機構還有尚宮局、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等六局,分工負責宮內事務。^①後宮組織同樣龐大,而唐制主要繼承了隋煬帝的思路,所謂“增置女官,准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②後宮的主人其實是皇后,這一點是無疑的。所以,就天下人而言,既需要向皇帝稱臣,也要向皇后稱臣,這是法令規定的。就此一點說,齊士員在《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中稱唐高祖與穆皇后為“二聖”,也在情理之中。那麼後宮人將皇帝與皇后合稱為“二聖”,是完全正常的,一位是天下的主人,一位是後宮的主人,在後宮的範圍內這樣稱呼,並不違背皇帝普天之下的至上權威。

從獨孤皇后的情況看,無論是《隋書》還是《北史》,在記述宮中的這種稱謂的時候,是一種正面表述的口氣。因為獨孤皇后的意見總能與隋文帝的意見合拍,所以宮中尊稱為“二聖”。比較起來,《北史》把“二聖”之稱號的理由敘述得更明確,不僅與上意合拍,還有個人修養的原因,獨孤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顯然十分正面。大概也因為如此,有關隋文帝懼內的文字並不鮮見。究竟是隋文帝十分尊敬獨孤皇后還是懼怕,這其中的距離是很難測量的,而就個人而言,獨孤皇后的家世已經衰微,隋文帝的懼怕來

① 以上後宮之女官、六尚之局,俱見《唐六典》卷一二,頁347—355。

② 《隋書》卷三六《后妃傳》,頁1107。

自何方？所以，尊敬，應該是更可能的。

那麼，太子稱呼皇帝、皇后為“二聖”如何理解呢？首先，太子在這個問題上與天下人一樣，都要稱皇帝為陛下、皇后為殿下，而在自稱上必須稱臣。就君臣關係而言，太子與天下人對於皇帝、皇后是一樣的。另外，太子與皇帝、皇后的來往，還存在家禮的層面，而所謂家禮，並不如朝廷禮儀那麼嚴格。武德時期，“太子、二王（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①所謂家人禮，在這裏就是在強調與朝廷禮儀的區別，顯然是比朝廷禮儀簡便、簡單的。

太子所在東宮，東宮的官員都要對太子稱臣，同時對皇帝稱臣。東宮的首腦自然是太子，但是太子與皇帝、皇后的關係，除了父母層面以外，似乎皇后也有領導的責任。《舊唐書》長孫皇后的傳記記錄“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②結合《新唐書》的同一記載，可以認為東宮要增加器用，所需奏請的對象是皇后，而長孫皇后“不聽”，即不准。從大的方面而言，東宮也是宮中的一部分。那麼，太子稱皇帝、皇后為“二聖”，與隋文帝時期的情形是一致的，屬於宮中之稱謂。

薛元超在給太子的上啓中，身份很清楚，不是以中書令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所以上啓即以“臣”開篇。文中說到皇帝、皇后的時候使用了“二聖”稱謂，也是符合作為東宮官的身份的。太子稱皇帝、皇后為二聖，那麼東宮官的同樣稱謂可以看作是隨太子之

①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頁5958。

② 《舊唐書》卷五一《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頁2166。《新唐書》卷七六記載略同：“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頁3471。

稱,完全可以理解。^①對此,《冊府元龜》記載道“薛元超爲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侍太子。元超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②唐高宗對於薛元超的行爲是表示嘉獎的。

即使是東宮官員,有的上啓但稱皇帝不及皇后。“韋承慶爲太子司議(儀)郎。儀鳳四年,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戶奴等與之款洽”。承慶諫言提及高宗謂“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③沒有提及當時的天后武則天。其他上書只稱皇帝不言皇后的大有證據。根據《冊府元龜》卷五四三《諫諍部·直諫》中的記載,列簡表如下:

時 間	上書人物	皇帝稱謂	皇后稱謂	備 注
龍朔元年(661) 四月	李君球	陛下		頁 6513 上
龍朔三年	張文瓘	陛下		頁 6513 下
咸亨元年(670) 三月	徐齊聃	陛下		頁 6514 上
永淳元年(682)	李善感	天皇		頁 6514 下

上表,留下皇后稱謂的一例也沒有發現。這些上書如此稱呼,

① 杜文玉先生引證薛元超此文指出文中“口口聲聲天后要求如何如何,對武則天尊禮備至”,與此同時卻“極少提到高宗對太子的企望與要求。可見在薛元超的心目中,武則天已凌駕於高宗之上”。見《關於薛元超的幾個問題》,《乾陵博物館、武則天研究會編《武則天與乾陵文化》(第五屆全國武則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頁189—200。薛元超此文,《冊府元龜》與《全唐文》有所不同,而最關鍵的兩句“天后所賜誠書,殷勤至切”,“遵天后誠書,不敢失墜”,此《全唐文》的內容(頁1627下,1628上),而《全唐文》所作“天后”處,《冊府》皆作“天皇”。其實,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天后,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天后有誠書是母親教育兒子,很正常。至於薛元超在這裏是否表現出揚后抑帝的動機,很難看得出來。

② 《冊府元龜》卷七一一《宮臣部·褒寵》,頁8466下。

③ 同上書卷七一一《宮臣部·規諫三》,頁8491下。

其實面奏也是如此。總章二年(669)冬,唐高宗要西巡涼州,來公敏當面諫諍,只稱“陛下”,不提皇后武則天。^①這些事實可以證明,所謂“二聖”稱謂問題,是指羣臣違背皇帝制度,公然地以正式的方式將皇帝、皇后並稱,從而完成了貶低皇帝、擡高武后的作用。其實,這完全是後起的說法,在唐高宗時代並不存在。

如此一來,關於高宗、武后並稱“二聖”的問題,我們看到了兩種證明,凡是兩《唐書》、《通鑑》這樣的史書,都十分強調這種稱謂的普遍使用,或稱“中外”或稱“天下”,甚至《新唐書》還直接說明二聖用於“羣臣朝、四方奏章”這種十分正式場合。但是,在我們找到實際的用例時卻發現,使用“二聖”的範圍十分有限,與隋文帝、獨孤皇后一樣,只是在宮中而已。而朝臣的上書或面奏,在唐高宗的時代,我們可以找到只稱陛下或者天皇的例證,並沒有發現皇帝、皇后並稱的情況,更不見“二聖”之說。這種差異說明什麼呢?是我們搜集的資料有限,還是史書有誇大這個稱謂的傾向呢?難道是原本宮中的習慣用語,被後來的史學家當作武則天權力與天子無異的證據,從而為維護皇權的至上性、揭示武則天一步步篡奪唐朝提供“名不正則言不順”方面的證據嗎?

三 來自石刻史料的強大旁證

從當時人留下的直接證據中尋找“二聖”的使用,是我們今天可以修正傳世史書不確處的重要途徑。石刻史料,正是能夠給我們提供證據的重要資源。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書,收錄了很多龍門造像石刻題記,其中高宗時期的這類資料,正符合我們討

^① 《冊府元龜》卷五四九《諫諍部·褒賞》,頁6594上。

論的主題。劉景龍、李玉昆先生主編的《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①，從現存視角看，彙集當地資料最為完備。通觀這些石刻，很多人都是為追求冥福而作，為逝去的親人祖先等祈告冥福，並不主動與政治人物聯繫。有的會提及皇上，如貞觀十五年(641)五月四日《韓文雅題記》中寫到“上為皇永隆，下為去先亡七世父母。”^②這種提法屬泛泛之詞，並不一定非理解為突出政治不可。

突出政治的石刻題記，或者擁有鮮明的時政意識，或者隨風氣所向，更有作者本身就是具備一定政治身份的人。如《青州刺史趙王福題記》，其內容為：

大唐顯慶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趙王福為太宗文皇帝，敬造彌陀像一軀。願四夷順命，家國安寧，法界衆生，普登佛道。^③

趙王李福是唐太宗的兒子，他如此行事當然很正常。這與平常百姓的動機差不多，都是為亡靈祈福。

我們重視的是在高宗時期，如何稱呼皇帝與皇后。

薛仁貴是著名戰將，咸亨元年(670)因大非川之敗除名。據《舊唐書》本傳，薛仁貴後來任雞林道總管得以東山再起。^④據《高宗紀下》，咸亨五年二月，劉仁軌任雞林道大總管。^⑤由此可知，至少，至咸亨四年，薛仁貴還沒有再次起用。但我們卻發現了他在龍門石窟中的造像題記，其內容如下：

薛仁貴奉為皇帝、皇后敬造阿彌陀像一軀，並二菩薩。普

① 《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下簡稱《彙錄》。

② 《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5年，頁199上。下簡稱《八瓊室》。

③ 同上書，頁188下。

④ 《舊唐書》卷八三，頁2782—2783。

⑤ 同上書卷五，頁98。

共法界蒼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①

薛仁貴曾經是右威衛大將軍（正三品），封平陽郡公（正二品），絕對屬於政治高層人物，如果說武則天炙手可熱與皇帝威權無異，天下皆恭稱“二聖”的話，以薛仁貴當時除名在家的情況看，他怎麼會如此不知趣，竟然只寫皇帝、皇后而不寫“二聖”？

就在薛仁貴造像的前一個月，將作監丞牛勣德也來造像，題為：

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將作監丞牛勣德奉為皇帝、皇后、皇太子並諸王、國戚敬造阿彌陀佛一龕，勢至、觀音菩薩二龕。^②將作監丞，正六品下，根據《唐六典》的記載，將作監丞“掌判監事。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俟省符，以諮大將，而下於署、監，以供其職”。^③將作丞雖不是什麼高官，但是屬於中央官員，不該有政治糊塗病，放着討好大權在握的皇后的“二聖”不叫，偏偏要用皇帝、皇后的稱謂。而從牛勣德的題記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很周到的官員，連皇太子、諸王、國戚都一一提及，怎麼可能偏偏在“二聖”這個稱呼上粗心不提呢？

僧惠簡的造像題記是在牛勣德題記的幾個月以後，那個洞窟因此被稱作惠簡洞，其詞曰：

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法海寺）僧惠簡，奉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伏願皇帝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④

① 《八瓊室》，頁206上。

② 參見張乃翥《武則天與龍門石窟佛教造像》，載《武則天與洛陽》，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頁17—31。下簡稱張乃翥文。《彙錄》的錄文有所不同，作者為“牛懿德”，但是“奉為皇帝、皇后□□□王諸王國戚”等字的存在，與本文的主旨並不衝突。見頁9—10。

③ 《唐六典》卷二三，頁594—595。

④ 《八瓊室》，頁206上，張乃翥文，頁18《彙錄》，頁179。

這位來自長安法海寺的僧人，正在參與一項重大的國家工程，即著名的奉先寺的建造。該寺的盧舍那大佛是龍門石窟的代表作。該工程從咸亨三年四月開始到上元二年十二月完成。高宗皇帝所建，皇后還特地捐獻脂粉錢二萬貫。^①其實，將作監丞牛勣德也應該是因為這項工程來到洛陽的。

僧惠簡是位深通政治的和尚，在他的造像題記中申明，造像是為了皇帝、皇后，還有太子和周王。當時的太子是李賢，而周王就是後來的中宗李顯，不知道為什麼不提同時的相王李旦。他把親王都寫入自己的題記，顯然是為了政治保險，如果當時內外官人不論上書還是面奏都把武則天與唐高宗並稱“二聖”，這位政治性如此嚴謹的和尚無論如何不該不從衆的。

更多的造像題記並不提及國家最高統治者，而提及唐高宗時期的，沒有發現一例是把皇帝、皇后並稱“二聖”的。以下列一簡表，把上文沒有提及的龍門造像題記內容納入其中，證明“二聖”之說在當時社會上並無反應。

龍門石窟高宗時期皇帝、皇后並稱題記一覽表

時 間	供養人	稱 謂 原 文	出 處
上元二年 (675) 十二月	周遠志等	奉為天皇、天后、太子、諸王……	彙錄，頁 550。
儀鳳四年 (679) 六月	太常主簿高光復等	奉為天皇、天后、殿下、諸王、文武百官	八瓊室，頁 207 上；張乃翥文，頁 23；彙錄，頁 556—557。
調露二年 (680) 二月	張感仁等	上為天皇、天后，一切法界衆生七代父母……	彙錄，頁 114—116。

① 參見張乃翥文，頁 19—20。

(續表)

時 間	供養人	稱 謂 原 文	出 處
永隆元年(680) 十二月	闡法寺僧大滿	上爲天皇、天后	八瓊室,頁 207 下。
	沙門智運	奉爲天皇、天后、太子、諸王	張乃翥文,頁 24。
永淳元年(682) 十一月	衛州共城縣人蘇鎬	奉願天皇、天后聖德延昌……	彙錄,頁 115—116。
永淳二年四月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盧公妻李氏	伏願天皇、天后……	張乃翥文,頁 25—26; 彙錄,頁 328。
垂拱二年(686) 四月	弘濟府長上折衝蘇文達	奉爲高宗天皇大帝、太后、皇帝、皇后七代父母……	彙錄,頁 3。
垂拱三年七月	雍州醴泉人王君意	敬爲天皇、天后……	張乃翥文,頁 27; 彙錄,爲二年,頁 230。
垂拱三年某月八日	佛弟子劉孝光	上爲天皇、天后……	張乃翥文,頁 28。
垂拱四年三月	秦弘等	爲皇太后、皇帝、皇后……	八瓊室,頁 210 中; 張乃翥文,頁 28; 彙錄,頁 553。
永昌元年(689) 五月廿七日	佛弟子皇甫毛仁	上爲聖母皇帝、師僧父母	張乃翥文,頁 28。
如意元年(692) 閏五月	丁君義	上爲天皇、天后……	八瓊室,頁 211 上; 張乃翥文,頁 28; 彙錄,頁 162。
大足元年(701) 三月八日	佛弟子閻門冬	奉爲聖神皇帝陛下及太子、諸王……	八瓊室,頁 211 中; 張乃翥文,頁 29。

(續表)

時 間	供養人	稱 謂 原 文	出 處
長安元年(701) 十二月八日	張阿雙	聖神皇帝陛下及太子、 諸王、師僧父母……	張乃翥文,頁29。

時間不確,只言天皇、天后的題記,這裏沒有列入。表中所列造像題記,年代稍前者皆有爲天皇、天后字樣,稍後者都是爲聖神皇帝、聖母皇帝等。背景不同,文辭固有區別。

唐高宗和武則天分別稱爲天皇、天后,是從咸亨五年(674)八月開始(本月改元爲上元)的,所以天皇、天后之稱代替皇帝、皇后的題記都發生在這以後。垂拱年間的三條題記是在武則天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的時候,但是題記書寫者看來都是一般百姓,沒有什麼政治身份,所以反應並不靈敏,依然在書寫天皇、天后。尤其是如意元年(692)的丁君義題記,當時武則天已經稱帝,可是丁君義還書寫天皇、天后。這可以看作是民間天皇、天后的稱謂影響巨大,以至於後來的題記還在繼續使用這個已經過時的稱謂。^①

永昌元年(689)皇甫毛仁題記稱“聖母皇帝”,這應該跟前一年五月武則天加尊號“聖母神皇”有關。聖母神皇尊號,不是皇帝的正式稱號,是武則天探索升位爲皇帝的一個臺階,而該題記徑直稱謂“聖母皇帝”,不知是尊號的誤置還是有意爲之,或許在民間並不在意“聖母神皇”與“聖母皇帝”有什麼差別。當時武則天人在洛陽,第二年改洛陽爲神都,如果她有機會看到皇甫毛仁的題記,一定要附以民意或者天意的解說。武則天載初元年(690)九月改元天授,並篡唐爲周稱帝,此後,龍門石窟的題記中很自然又多

① 最近在河北柏林禪寺看見一件天寶時期的石刻,也寫着天皇、天后供奉,歷時竟然如此之久。

出一些張阿雙題記之類內容，本屬題中之義，所以本文不再列舉。

在傳世文獻中，我們只見宮中對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的實用例證，而朝臣的上奏皆為“陛下”或者“天皇”，至於同時期的造像題記，“二聖”稱謂的卻一件都沒有見到，所見都是皇帝、皇后或者天皇、天后之稱。所謂的中外並稱或者朝見、奏章的“二聖”之稱，更沒有找到實用例證。且不說高宗、武則天時期二人長期住在洛陽，而龍門石窟正屬於洛陽管轄範圍，這到底說明什麼呢？兩類資料中，這個差距甚至矛盾是如此明顯，我們今天該如何理解呢？如果確有《通鑑》等所說中外都稱高宗、武則天為“二聖”，那麼上引這些不稱“二聖”的造像題記就不該存在。因為造像題記是寫在明處的，在表達對佛教的祈福以外，對於政治，人們沒有必要甘冒危險，而政治正確當然是安全的最主要保證。如果朝廷通行“二聖”之稱謂，那麼在龍門的石刻題記中就理應有所反映，相反，龍門石刻題記中沒有一例“二聖”稱謂，應該證明當時並不存在什麼天下皆稱“二聖”之事。

龍門石窟的這些題記，畢竟多把皇帝、皇后連寫在一起，是否會有人認為這也能說明武則天的一定地位呢？對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告訴讀者，民間的這類石刻題記，有一定的傳統，多數是不與政治聯繫的，即有聯繫者，也主要是形式主義的。如北魏神龜二年（519）九月《崔勣造像記》有“上為皇帝陛下、三公、主司，後為居家眷屬……”字樣。^①正光六年（525）《蘇胡仁十九人等題記》有“為皇帝陛□”等字樣。^②北朝造像中這種祈願文涉及皇帝、朝廷，至少已經是一種套話。^③隋仁壽元年（601）十月十五日《諸佛舍利

① 《八瓊室》卷一五，頁86中。

② 同上書卷一四，頁76上。

③ 參見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中篇第三章第六節“世俗祈願——略論民眾人生取向的變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211—217。

寶塔》銘文有“皇帝普爲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於同州武鄉縣大興國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並內外羣官爰及於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升妙果”。^①此舍利塔設在同州，同時青州也有一個同樣的舍利塔，銘文幾乎一樣。^②這是以皇帝名義設置的舍利塔，但其中卻分明有祝願皇帝、皇后的內容，即使這個寫法不一定能夠成爲天下楷模的話，至少可以證明，在佛教祈願文字中，皇帝、皇后的寫入，從唐朝的視角看，已經是淵源有自了。

武則天稱帝，確實是唐朝的一大政治教訓，因爲根本無此先例，防範即無從說起，於是後來人就通過歷史書寫的方式來防止武則天現象的重演。從《唐會要》的模糊記載看來，或許唐代國史系統已經如此撰寫，兩《唐書》以及《資治通鑑》在同一方向上變本加厲，於是唐高宗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就成了人所共知的“史實”。然而，真相是“二聖”之稱只存在宮中那個狹小的範圍內，根本沒有什麼天下共稱，更沒有什麼朝會、奏章的正式稱號。把一個習慣尊稱從小範圍擴大化爲全國和天下共稱，性質因此發生改變，從而不僅成爲武則天專權的表現，也成了武則天專權的證明。通過書寫改變歷史的真相，這雖然不是什麼重大事件，但也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宋代學者研究唐朝歷史，所見史料理應多於後代。司馬光長期居住洛陽，龍門石窟也是他時常光顧的地方，但是爲什麼本文所舉資料，一件也沒有進入他的法眼呢？可見，即使如司馬光這樣優異的史學家，也會發生因循前人太過的問題。

(本文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① 《金石萃編》卷四〇，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85年，葉3A下。

② 同上書，葉3B上。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iji Japan's *Kangaku* Opinion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Modernized Chinese Literature Discipline

Lu Yin (p. 89)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 the import of western academic subjects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e of Chinese Learning (*Kangaku* 漢學) in Japan. However , during the second ten years of the Meiji period , the Japa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revived *Kangaku* as an object of academic study.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also had influence upon the fate of *Kangaku*. Scholars in Imperial University laid a special emphasis on academism , while the opinion leaders were requesting more enthusiasms for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1890 , the *Kangaku-ka* (漢學科) in Imperial University had cultivated a series of talents with both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humanities and the deep concerns to the social reality , who were called “New *Kangaku* Researchers”.

On “Two Sovereigns”: Emperor Gaozong and Wuzetian

Meng Xianshi (p. 137)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zong of Tang , Wuzetian and Gaozong together were called “two sovereigns 二聖” as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books write. Actually , the very words “two sovereigns” had only appeared twice , both used in the palace city. There were no examples in the official papers , popular works or inscriptions of Longmen grottoes. So the so-called “two sovereigns” was just the

overstatement of the fact.

**Han Huang and Emperor Dezong of Tang: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hai jun (Zhexi)
and the Court in the Jianzhong-Xingyuan Era**

Li Biyan (p. 157)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Dezong in Tang (779–786) witnessed the spring of Zhen-hai jun (Zhexi) in Jiangdong. Govern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Han Huang, Zhen-hai jun (Zhexi)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province in southern China. So the governor Han Huang got promotion continuously, and became powerful after the war. However, this situation brought the friction between him and Dezong. Soon after he died, Dezong took measures to weaken the power of Jiangdong.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event so far. It further discusses why the image of Han Huang was changing in the texts in the different eras, and how the given impression of the southeast provinces and their governors shaped.

On “*Tongji*”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ang Dynasty

Chen Wenlong (p. 207)

The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new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planation on the phrase “*tongji*”, which turned up frequently in historical records after Kaiyuan period (713–741)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It argues that “*tongji*”, which literally means official paper works for permissions to palace in inner court, implies *changcanguan* (consultants-in-ordinary) in a metaphoric way,